

「集體記憶」專題引言

楊 瑞 松^{*}

「記憶」，對於每個生命個體而言，無疑是維持生活運作不可或缺的要害。當我們每天清晨睜開雙眼，迎向新的一天到來時，我們並不是腦中一片空白，重新一點一滴地認識周遭一切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人事物。我們可能「很自然地」一早醒來就往特定的方向，「很自然地」進入盥洗室整理儀容，然後「很自然地」開始準備出門上班工作。這些似乎是自然而然、不需要意識思索的一系列行為，事實上都有賴於我們許多日積月累的記憶運作，因而讓我們得以日復一日「正常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到來。當然，如果記憶的功能突然失效，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運作也勢必無法進行。失憶的結果，正如同今年奧斯卡的得獎影片 *Still Alice*（《我想念我自己》）的女主角所經歷的痛苦恐怖的過程，不僅陷入對自己和周遭完全一片陌生的感覺，而且最終幾乎成為無時無刻只記得短暫當下發生的事，喪失自我認知和與他人互動的生活能力。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每個生命體，即使在所謂正常的記憶運作之下，也不可能記得他生命所經歷過的所有事物。姑且不論生理上記憶能力的限制性，我們在有意無意之間也對過去的經歷採取了選擇性的記憶。有些過往的事蹟可能一輩子銘記在心，但有些經歷卻可能完全沒有印象，即使透過他人的提醒或是書面紀錄的確認，但可能僅保有支離破碎的記憶。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單獨個人記憶和失憶的現象，無疑是各類醫療病理學、腦神經學，或心理學等學門研究關注的課題。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分析，探討記憶功能的運作和失能，企圖解開有關人類記憶／失憶的謎題。但對於歷史文化社會研究而言，考察社會成員「集體記憶」或是「集體失憶」的相關現象，無疑是深入了解社會文化運作機制的一條重要管道。長期以來，多項人文社會研究學門，包含文化研究、歷史學、文學研究、社會學等對於「集體記憶」的課題，都對集體記憶的課題展露高度的研究關注。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在《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的名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可謂言簡意賅地點出了，對於過去歷史的詮釋權和現實權力之間的相輔相成的關係。而對於知識和權力關係深懷洞見的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更直言記憶是權力鬥爭中的重要環節：「如果一個人掌控了一個族群的記憶，那他就控制了他們的動態」，「擁有這個記憶是非常地重要，去操控支配它，並告訴它必需記得什麼。」

不同於個人的記憶運作，所謂「集體記憶」的內容和運作方式，往往不是個人的親身經歷或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我們所處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的產物。不論是我們每個人所接受過的國民歷史教育，或是生活中公共空間中的紀念雕像、國定紀念假日，甚至是特定街道名稱，都經由公開或潛移默化的過程，形塑我們對於特定歷史人事物的記憶和意義感。相對地，曾經和社會多數人生命經驗息息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卻也有可能經由時間流逝或是有意的社會控管檢查機制，進入「集體記憶」的「黑洞」，成為被埋葬、被忘卻的「集體失憶」。發生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或是二戰期間波蘭大量軍官被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下令屠殺的卡廷（katyn）慘案，以及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都經歷了長期被迫遺忘的人為「集體失憶」過程，其中有些到目前為止仍處於被埋沒和管控的情況，而有些事件即使不再被刻意遺忘，但是其歷

史真相乃至於其意義，仍是處於莫衷一是、混沌未明的情況。也正因為集體記憶／失憶現象的背後，有許多值得關注深究的權力運作課題，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在思考有關「集體記憶」的研究重點時，不忘時時提醒研究者要去挖掘了解“who wants who to remember/forget?”、“what and why?”的議題，從「集體記憶」和「集體失憶」的兩個對比面向著眼，從而理解權力操控和「集體記憶」之間的複雜關係。

正如同個人的記憶對於每個人的自我認知具有關鍵性作用，同樣地，「集體記憶」對於社會成員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也往往扮演重要角色。社會成員的「集體記憶」內容的變動，一方面反映了權力操控的形塑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會成員「集體認同」的變化。有關於這個議題，發生在兩千年前的 Masada 歷史事件是一項最佳例證。誠如許多研究所指出，這事件的近代歷史意義變化適足以說明猶太族群的「集體認同」的變化。在這一遠古事件中，70 多位猶太士兵選擇以自縊而非投降的方式面對強大的羅馬敵軍。長期以來，這一事件在猶太「集體記憶」中並未佔有顯著地位，但是隨著近代猶太建國意識的興起，它開始被賦予重要的歷史意義，象徵猶太人誓死抗敵不從的決心，成為建構猶太人當代認同的重要的歷史神話。

有關「集體記憶」的探討，無疑提供了許多相關的議題來深入研究社會思想文化的各種面向。例如由 Pierre Nora（1931-）主編的 *Realms of Memory*（《記憶所繫之處》），即是以各種多元面向課題來探討近代法國「集體記憶」和認同的形塑過程與效應的「重量級」研究著作。其中收錄的文章包羅萬象，例如以艾菲爾為主題的研究，或是法國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的演變的探討，甚至是環法自行車的議題的探究，都可以看出有關「集體記憶」課題研究的多樣性和活潑性。本刊這一期的「集體記憶」專題，收錄了三篇相關論文，分別處理了在三段不同的時空環境中，特定的歷史人事物的「集體記憶」的變化。其中關於臺灣的韓戰記憶，以及當代中國 1976 年

的四五運動兩篇論文，都討論了「集體失憶」的歷史現象；而有關雍正形象轉變一文，則透過雍正不同形象的變化，揭示「集體記憶」變化所具有的意義。

對於現代一般大眾而言，在傳統中國各個王朝的皇帝中，清雍正皇帝應該算得上是頗有名氣。在制式的教科書中，儘管雍正在位的時間不長，但是所謂「康雍乾盛世」的歷史敘述，使得雍正作為勤政（但不見得愛民）的明君形象有一定程度的流通性。而近年來種種有關「雍正大帝」的電視劇集，更是使得這位清初皇帝成為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本專題第一篇由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黃璿璋撰寫的〈集體記憶與俠義概念：清末民初野史中雍正形象之正統與裂變〉論文中，作者基於本身的文學分析專長，巧妙地藉由分析清末民初的野史小說中所呈現的各種雍正形象，探討這些形象和當時的思想文化之間的脈動關係。例如作者將清末野史小說中所再現的有關雍正的傳說故事，視為當時的「集體記憶」，是對於正史中的雍正所代表的清統治權正當性的挑戰和顛覆，進而迎合當時強調滿漢差異、漢族反滿建國的革命思潮。而在民國初期武俠小說大行其道之時，雍正和漢人爭鬥的歷史故事又被轉化為俠與俠之間的恩怨爭鬥，而所謂呂四娘砍殺雍正頭顱的故事，更是被賦予文化種族復仇的象徵意義。誠如作者所言：「本文即試圖將雍正野史的研究從歷史學的檔案延展到文學場域，聚焦於清末民初雍正的野史敘事，從文學的『想像』中探究敘事背後的社會集體與個人的情境（context），重新觀察、定位雍正故事背後的深層內涵與意義。」透過作者的仔細分析檢視，我們看到近代藉由新興印刷事業而具有廣大流通性的通俗小說中所再現的歷史人物，儘管可能和所謂的正史中所記載的內容和意涵大異其趣，卻可謂同時建構也反映了特定時空下的「集體記憶」，因而讓我們對於當時的思想文化價值的走向有更豐富的理解。

對於臺灣的一般讀者而言，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潘宗億助理教授所處理的1976年「四五運動」，應當是相當陌生的「歷史記憶」。如

果說另外兩篇論文的主題（雍正和韓戰），藉由歷史教育和戲劇小說或是政治宣傳，都在臺灣一般大眾的「集體記憶」中佔有（或曾佔有）顯著的地位，那麼發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的「四五運動」，則完全不在臺灣的「集體記憶」之中（有趣的是，潘文中和「四五運動」所對比的「五四」和「六四」則又另當別論）。然而不管如何，誠如作者所指出，即便對於當代的中國人而言，這個事件也已經幾乎成爲被遺忘的歷史，成爲「集體失憶」的一環。潘宗億對於此一歷史事件的分析，主要以「天安門詩抄」等抗爭文學、中共官方歷史文本與報刊等文獻爲基礎，探析群眾與官方如何不斷召喚或利用「五四」與「四五」符碼或「關鍵詞」來合理化本身的政治訴求或命令。他同時也關注中共官方所建構的紀念性、儀式性與紀律性空間，如何被群眾挪用轉化，以合理化其悼念周恩來（1898-1976）與批判「四人幫」的物質與文化基礎。從作者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官方所神聖化的革命傳統記憶，以及其相關記憶的「所繫之處」（即天安門廣場），如何成爲抗議群眾所用來合理化其運動的正當性。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不同於至今仍被官方定調爲反革命的「六四」學運，「四五運動」在1978年即已被平反，被中共官方定位爲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但是，它何以仍然成爲被遺忘的歷史？潘文在其分析中對於此失憶現象的原因提供了若干解釋。其中之一乃是在官方的定調中，儘管「四五精神」是符合所謂革命傳統和鄧小平（1904-1997）的「四個現代化」精神，但是四五精神所具體代表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終究是官方的大忌。簡言之，在新一代的領導人藉由四五運動打倒舊政治勢力後，在可謂「兔死狗烹」的情況下，具有煽動群眾抗議熱情潛能的「四五」紀念活動，也就在官方主導下大幅減少。在這樣被刻意淡化遺忘的情況下，「四五」記憶的召喚唯有在1989年的另一波大規模抗議運動中才又出現，但是隨著「六四」的悲劇命運的發展，終究還是難脫爲「集體失憶」的一個環節。

從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藍適齊助理教授的論文標題：〈從「我們的」

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可見作者已經預告了這是一篇有關從「集體記憶」到「集體失憶」的分析作品，同時也從檢視這個過程中，看到了「我群」的「集體認同」的變動走向。的確，對於現在生活在臺灣的人而言，關於發生在1950年代初期的韓戰記憶，存在著明顯的記憶落差。對於大多數中年以上的臺灣人而言，所謂「一二三自由日」，就如同其他「反共義士投奔自由」相關歷史事件一樣，應當仍是記憶猶新的「集體記憶」。然而，對於年輕的世代而言，尤其是九〇年代之後出生的世代，韓戰可能僅僅是歷史課本中所稍微提及的歷史事件，至於其所引發的種種「歷史記憶」和政治意識形態意涵，則可謂是一片空白。當然，從戰爭的真正參與者角度而言，臺灣人並未真正介入韓戰；但是若從戰爭結果對於臺灣政治前途的重大影響，以及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如何把「反共義士」建構成韓戰「集體記憶」的核心面向來看，韓戰卻又的確是攸關臺灣現代史的一件大事。然而，儘管在初期官方大力宣傳主導下，韓戰成為對臺灣人的「我們的戰爭」，但根據藍適齊的分析，這樣的意象從1960年代開始出現顯著的變化。隨著臺灣國際局勢的轉變，韓戰的「反共義士」不再被賦予如過去的重要意義，紀念性的新聞報導也日漸消退。尤其之後隨著臺灣和韓國外交關係生變，臺灣本土認同意識的興起，以及兩岸之間關係變化等各種內外因素，韓戰在臺灣的「集體記憶」中可謂銷聲匿跡。從藍適齊的論文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集體失憶」發展的軌跡，同時也藉此軌跡更清楚地理解臺灣「集體認同」的變化走向。

《東亞觀念史集刊》在本期選擇以「集體記憶」作為專題，一方面基於此研究課題所具有之跨領域重要性的考量，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為「觀念」的分析和集體記憶課題的探討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前述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變化和法國集體記憶的研究即是一明顯的例證。而其他集體記憶的相關研究，也都再再顯現它們和觀念分析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即以本期專題所收錄

的論文為例，在它們的探討重點中，也都包含重要觀念變化的比較分析。在清末民初雍正集體記憶的研究中，作者即著墨於政治論述上的君臣「大義」觀念和通俗小說中所強調的「俠義」觀念的對比分析。在韓戰記憶的論文中，作者解析所謂「反共」觀念／意識形態的變化（「抽象化」、「世界化」，是影響臺灣韓戰記憶走向的重要因素。此外，「四五」和「五四」，乃至於「六四」，都不僅僅是一項政治／社會運動的代稱符號而已，它們也是承載各種觀念價值的重要符號；而各種論說爭奪定義這些符號所應代表的觀念之相互角力過程，也正是形塑集體記憶／失憶過程的重要環節。由此觀之，在探討集體記憶課題的研究過程中，針對各類型相關「觀念」的分析實具有相當關鍵性的作用。

此次專題的三篇論文雖然主題上各有所偏重，但是每位作者依其所學專精，運用各類文本資料，嘗試用不同的研究視角和取徑，探討和「集體記憶」相關的歷史課題。當然，就取材的代表性和方法論而言，仍有若干值得進一步商榷的空間，例如：如何能比較確切地論證通俗小說和報紙評論的論述和「集體記憶」的關係？又或者，如何更深入地分析官方操控的記憶／失憶和公共「集體記憶」之間的落差抗衡或交互影響的關係？然而，無論如何，透過三位作者所檢視分析的主題，我們對於權力機制之於「集體記憶」的操弄、「集體記憶」和「集體認同」的關係，以及集體記憶／失憶的意涵和效應等議題，應都有更深層的理解。我們也衷心希望這些研究能激發更多相關的討論，讓「集體記憶」的相關研究能夠在學界有更進一步的發展。